

引用格式: 赵伟, 诸培新. 土地资源配置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J]. 资源科学, 2023, 45(11): 2144-2155. [Zhao W, Zhu P X. Impact mechanism of land resource allocation on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J]. Resources Science, 2023, 45(11): 2144-2155.] DOI: 10.18402/resci.2023.11.04

土地资源配置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

赵伟¹, 诸培新²

(1.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南京 210095; 2. 南京农业大学中国资源环境与发展研究院, 南京 210095)

摘要:【目的】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是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 对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及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本文旨在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探究土地资源配置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方法】基于2006—2017年长三角地区中心城市面板数据, 并采用bootstrap中介效应模型, 对政府管控、土地市场化及城乡融合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①理论上统一的城乡土地市场化配置相较于分割状态能够带来社会福利的增加, 而土地的准公共物品属性和政府的有限理性, 决定了城乡融合发展导向下的土地资源取向应是“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②以税收政策表征的政府管控行为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但产业政策的影响则不显著, 且研究时段内城市土地一级市场化和农地市场化都能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提高。③农地市场化和城市土地一级市场化在税收政策影响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这一路径的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19.29%、12.26%; 土地市场化在产业政策和城乡融合发展之间的中介效应则不显著。【结论】清晰界定政府和市场边界, 深化土地产权制度改革, 统筹城市和乡村制度体系联动是今后改革的方向。

关键词: 城乡融合发展; 土地资源配置; 政府管控行为; 中介效应模型; 长三角地区

DOI: 10.18402/resci.2023.11.04

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 全面推行乡村振兴”,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城乡关系演变的战略目标和根本遵循, 也是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要义, 对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1]。土地是城乡发展的关键要素和空间载体, 土地市场作为连接城乡发展的关键纽带, 对于支撑城乡之间要素的双向流动及优化配置具有重要的作用^[2]。土地市场化的本质就是通过一系列经济社会、法律等层面的变革来促进市场机制配置土地资源, 以达到土地市场配置的政策目标^[3], 农地市场化流转产生的边际产出拉平效应和交易收益效应, 能够提升农地利用效率^[4], 并且土地市场的发育能够不断显化土地价值, 并通过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及

流转机制规范使用者的行为, 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弥补土地竞租成本, 最终实现土地资源效率的提高^[5]。但长期以来, 中国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多属于经济发展转型下的被动改革,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滞后于城市, 造成城乡二元市场分割、政策扭曲导致的公平效率问题依然潜伏^[2], 阻碍了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6-10]。纵观中国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 无论是城市土地市场化改革、承包地改革还是“三块地”改革, 无一不经历“上升-下降-上升”的螺旋状市场化演变路径^[2]。学术界对土地市场化的研究已从是否要进入市场, 转向如何推动构建统一的城乡土地市场, 呈现出“土地市场化归因^[11]-土地市场化程度^[12]-土地市场化效应^[13]-土地市场化实现路径^[14]”演进脉络。长期以来, 中国城乡土地呈现二元割裂发展的局面, 不利于城乡融合发展^[15], 加之土地

收稿日期: 2023-03-01 修订日期: 2023-06-19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19JHQ093)。

作者简介: 赵伟, 男, 山东德州人,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城乡发展与土地政策。E-mail: zwwbq@stu.njau.edu.cn

通讯作者: 诸培新, 男, 江苏南京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土地经济与政策。E-mail: zpx@njau.edu.cn

2023年11月

市场化受政府的行政干预,导致人口与空间城市化的失衡,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发展差距,掣肘城乡融合发展^[16],而伴随着城市土地一级市场化产生的土地财政,带有明显的城市倾向特征也阻碍了城乡融合发展^[17]。而相比于政府干预,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具有更高的效率,通过市场机制进行土地要素的流转,可以有效消除城乡区域限制,助推区域城乡融合发展^[18]。理论及实践都已证明,土地要素配置由政府转向市场的制度变迁是必然之路^[19]。加快推动土地市场化改革,破除“低水平陷阱”以助推城乡融合发展^[20],推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改革,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农村土地市场发育能够通过土地价值释放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进而缩小城乡之间发展差距^[21],农地市场化的发展能够有效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并且在政府及城乡融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22]。因此,新时期继续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不断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有利于土地资源空间生产价值在城市和乡村地域系统的合理分配,推动实现城乡融合发展^[23]。

现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参考。土地市场化作为城乡发展的空间平台和基础,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一环,对于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及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长期以来,中国土地市场化配置都带有明显的政府行政干预特征,这会导致土地市场化配置对城乡发展的影响呈现利弊双轨的特征。然而,已有的研究大多从理论层面阐述土地市场化对城乡融合发展及乡村振兴的影响,但未能揭示其内在本质的本质,也未形成系统的论证;少数研究从政府或者土地市场化发展的角度实证分析对城乡融合发展影响,但未能综合考虑农地市场化的作用,无法全面揭示土地资源配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实际作用。鉴于此,本文首先基于理论层面对政府管控、城乡统一及分割状态下社会福利进行比较,提出城乡融合发展导向下的土地资源配需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协同作用;在此基础上剖析政府管控-土地市场化-城乡融合发展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最后采用bootstrap中介模型验证三者之间的内在作用关系,以期从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的视角为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相关的政策建议。

2 理论分析

2.1 帕累托效率比较:政府管控、城乡统一及分割状态下的市场化配置

城乡融合发展既是城乡空间均衡发展的过程,也是实现城乡地域系统经济社会发展效益最优化的过程^[23]。因此,可以将城乡融合发展视为社会经济发展效益即社会福利,借鉴钱忠好等^[24]的研究,设定以下前提条件:

(1)假设一定时期内,城乡非农建设用地自然供给具有有限性且其最大供给量为 Q_4 ,城市和乡村非农建设用地具有同质性,最大供给量分别为 Q_0 和 Q_2 ,满足 $Q_4 = Q_0 + Q_2$,同时农村建设用地市场对城市建设用地供给曲线无影响。

(2)假设 S_0 为城市建设用地供给曲线(政府管控下土地供给曲线), S_1 和 S_2 分别代表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分割及统一状态下农村非农建设用地市场供给曲线,并分别以 Q_0Q_1 和 Q_2Q_3 为渐进线。

(3)假设 S_5 和 S_4 分别表示城乡非农建设用地市场统一及分割状态下的总供给曲线,分别满足 $S_5 = S_0 + S_2$, $S_4 = S_0 + S_1$,并以 Q_4Q_5 为渐进线。

(4)假设 D_1 和 D 分别表示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分割状态、统一状态下的需求曲线,由于城乡非农建设用地市场分割状态还缺乏相关的法律政策支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还处于初期阶段),其土地市场交易成本和风险的存在致使城乡分割状态的需求、供给曲线都处于统一状态下曲线的下方。

图1中 P 和 Q 分别表示城乡非农建设用地价格、数量,城乡非农建设用地市场分割、统一状态下均衡点分别为 E 和 F ,政府管控下城市土地市场均衡点为 C ,均衡价格和数量分别对应各自均衡点。首先分析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分割及统一状态的社会经济发展效益变化(社会福利),由图1可知,城乡建设用地市场统一状态下社会经济发展效益会增加面积 $SP_0FQ_FQ_EEP_1$,说明土地市场化更能增加社会经济发展效益。其次,政府管控土地市场化与城乡非农建设用地分割状态下社会经济发展效益的比较。假设需求函数 D 、 D_1 的反函数分别为 $\varepsilon_1(Q)$ 、 $\varepsilon_2(Q)$;供给函数 S_5 、 S_0 、 S_4 的反函数分别为 $\vartheta_1(Q)$ 、 $\vartheta_2(Q)$ 、 $\vartheta_3(Q)$ 。假设 C_1 点的非农建设用地数量为 Q_{C_1} , Z 表示区域 $P_0P_1C_1C$ 的面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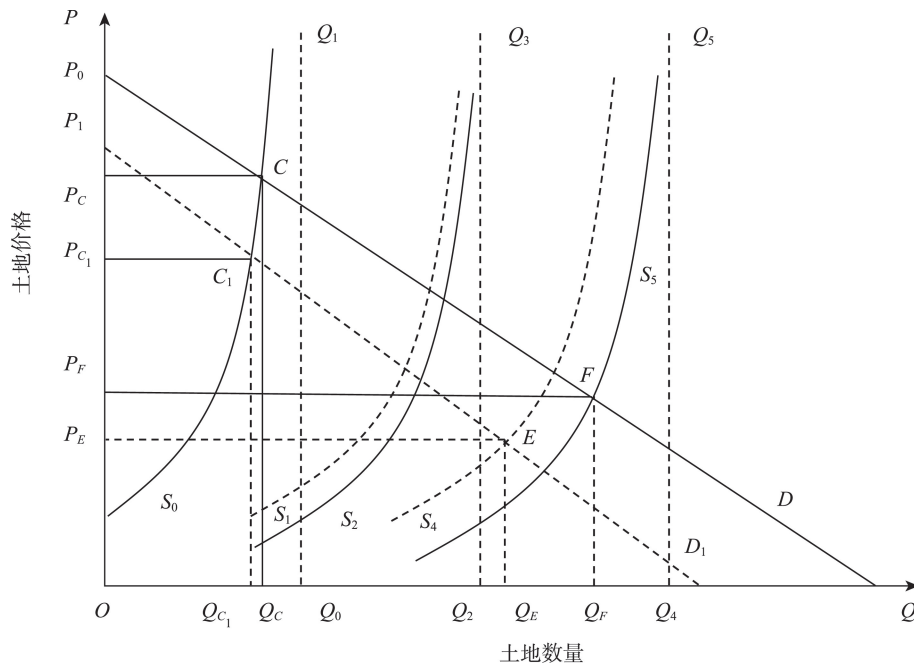


图1 不同状态下城乡非农建设用地市场效率分析

Figure 1 Urban and rural non-agricultural construction land market efficiency in different states

政府管控土地市场状态下的社会经济发展效益 W_1 为:

$$W_1 = Y_1 + \int_0^{Q_c} (P_c - g_2(Q))dQ \quad (1)$$

式中: Y_1 表示三角形 P_0CP_C 的面积。

城乡非农建设用地市场分割状态下的社会经济发展效益 W_2 为:

$$W_2 = Y_2 + \int_0^{Q_e} (P_e - g_3(Q))dQ \quad (2)$$

式中: Y_2 表示三角形 P_1EP_E 的面积。

那么将两式作差即可得到政府管控土地市场状态下与城乡非农建设用地市场分割状态下的社会经济发展效益差 ΔW :

$$\Delta W = \int_0^{Q_c} (g_2(Q) - g_3(Q))dQ + \int_{Q_c}^{Q_e} (\epsilon_2(Q) - g_3(Q))dQ - Z \quad (3)$$

如果 $\Delta W > 0$ 表明政府管控土地市场化的经济发展效益大于城乡非农建设用地市场分割状态下的社会经济发展效益,如果 $\Delta W < 0$ 表明政府管控土地市场小于城乡非农建设用地市场分割状态下的社会经济发展效益,表明政府管控土地市场化对社会经济发展效益的增加存在不确定性。事实上,发挥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要否定政府的作用,而是要减少不必要的政府干

预,此外由于垄断、信息不对称及外部性等因素可能会导致市场失灵问题,公共选择理论下的政府“政治理性人”假设的存在^[25],说明仅仅依靠政府来配置土地资源的策略也是有偏差的^[26]。

综上所述,城乡融合发展驱动下的经济社会发展不仅要实现提高资源效率的目标,也要考虑到整个社会福祉的增进。这就决定了土地资源的配置不仅需要市场机制的嵌入来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也需政府的管控作用来纠偏“市场失灵”以保障公平正义,即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协同作用,对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此,本文将围绕政府管控、土地市场化及城乡融合发展三者之间的内在作用关系展开分析,并深入剖析其内在作用机理。

2.2 理论内涵与内在机理

2.2.1 城乡融合发展理论内涵

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关系转型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对过去“以乡支城”“以城带乡”的继承和升华,是从城市主导的弱联系弱互动转向城乡平等的强联系强互动转变的过程。城乡融合发展是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城乡均衡发展为目标,通过城乡地域系统多种要素的相互作用及协同演化,实现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最终形

成城乡功能互补、协调共进、利益共享的命运共同体。城乡融合发展强调城乡地域系统的双向互动及体制机制,其本质是在城乡地域系统内,基于要素双向流动及资源优化配置,实现城乡在经济、社会、空间及生态多个维度层面的融合发展,关键在于实现城乡异质性的二元结构转向一元同质化结构的过程。据此,本文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界定为:城乡融合发展是在承认城乡客观差异及保留各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城乡两大地域系统要素双向流动及资源优化配置,促使城乡地域系统从各自独立逐渐演化为协调共进的复合系统的过程,最终实现城乡地域系统在经济、社会、空间、生态等维度的融合状态。其中,城乡经济融合是通过城乡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实现城乡边际报酬均等、劳动生产率趋于协同的状态;城乡社会融合强调城乡居民在就业、医疗等公共服务趋于等值化;城乡空间融合是城乡融合的载体和基础条件,反映城乡地域系统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实现人口和用地布局结构的合理化;城乡生态融合则是对城乡地域系统的全面协同治理,以实现城乡生态环境的高度融合互补状态。

2.2.2 政府管控、土地市场化配置及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分析

依据前文理论分析,本文围绕政府管控-土地市场化配置-城乡融合的逻辑框架对三者之间的内在机理展开分析。

(1)城市土地一级市场化对城乡融合的影响。一方面,良性土地一级市场化能够促进城乡发展空间外延,推动城镇化发展的进程,有利于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同时良性土地市场可以按照价格、竞争等机制实现土地资源在经济、空间及社会价值的合理分配,并借以市场化交易及土地融资缓解央地财政不对等的局面,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在政治锦标赛模式的激励作用下,地方政府加大土地融资力度会加剧城乡在公共服务、医疗教育等方面的不对等,导致城乡之间人口要素流动阻碍和城乡社会融合的受阻,也会滞碍城乡融合发展进程。

(2)农村土地市场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农村土地市场的不断发育,促进土地市场供给主体的多元化,有助于打破政府垄断一级市场的格局^[1],并通过功能性流转和权利流转实现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价”,从而实现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收益功

能及城乡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27]。一方面,农地非农化促进城乡空间的开发,在此过程中为乡村地域的发展积累大量的资金,促进城乡空间价值的提升及城市化的进程,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然而,受到以城市中心主义为导向的发展思维的影响,政府在农地非农化进程中背离市场化原则征收与供应土地,造成土地收益的不合理分配,从而进一步加大对乡村发展价值的剥夺,滞碍城乡融合发展。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化机制的嵌入,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既可以通过产权重构推动农地经营权流转,盘活存量闲散用地和低效用地,增加农村产业用地的有效供给,提高农村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28],推动城乡之间人口、土地要素的互动及交融^[29];又可通过资源配置的两种效应-边际产出拉平和交易收益效应,形成乡村劳动力资源的再配置^[4],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3)政府管控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政府管控行为主要包括税收和产业政策。一方面,政府通过合理的税收手段,优化利于市场竞争和资源要素流动的环境,并通过税收结构、比例、政策等方面的调整,提高政府公共服务(完善基础设施等)及社会福利的保障能力(如促进就业等),拉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30]。但财政分权背景下,政府税收分成比例的非均衡可能会加剧城市偏向发展战略的影响,形成对乡村二次不合理分配,制约城乡融合发展^[1]。另一方面,政府通过产业组织结构调整和产业空间的再配置,打通城乡之间产业互动的通道,促进城乡产业部门的优化调整,实现城乡经济结构的合理化与高级化^[31]。但在乡村多功能转型的过程中,产业发展的主体、制度等多元滞后现象可能阻碍城乡产业的互动融合发展,制约城乡融合发展步伐^[32]。

综上,政府管控对土地市场化配置及城乡融合的影响存在利弊双轨的权衡,取决于政府“援助之手”与“掠夺之手”功能的博弈取向,由此得出土地市场化在政府管控与城乡融合发展之间可能存在中介作用。

3 研究区概况、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3.1 研究区概况

长三角地区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的中心,是中国最大的城市群(图2),区域面积为35.67万km²,其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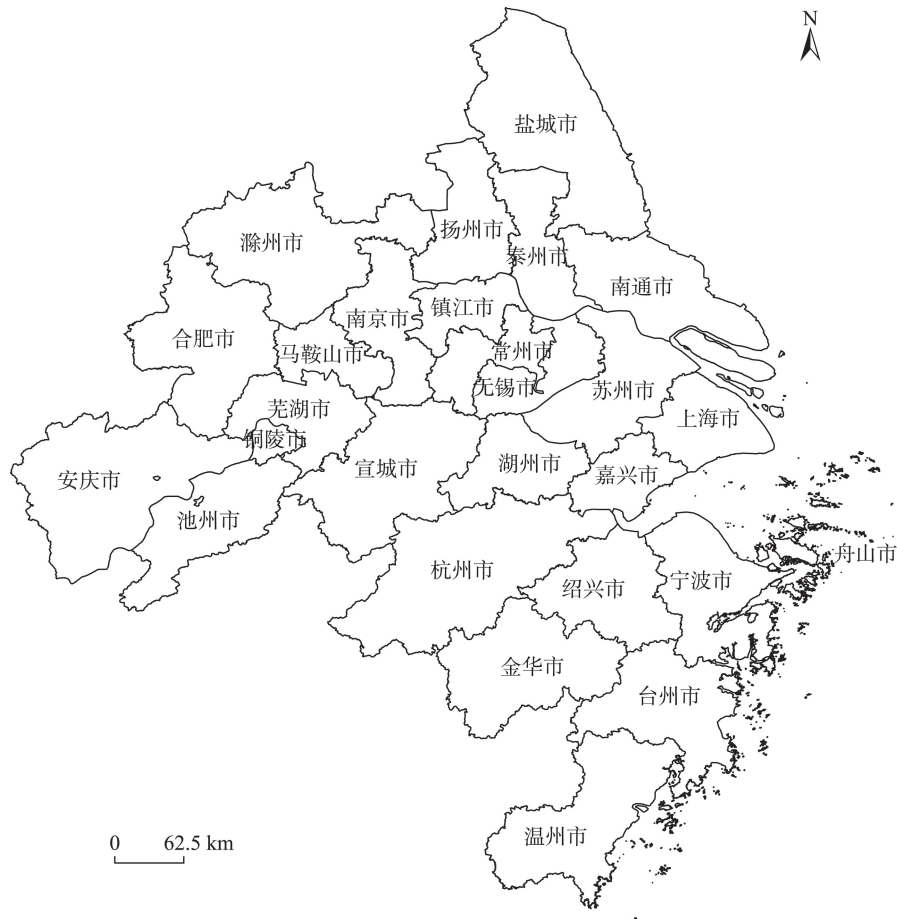


图2 研究区域概况图

Figure 2 Overview map of the study area

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及创新能力都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区域一体化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大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和引领作用,不断推进长三角地区城乡融合发展也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国内其他地区一样,长三角地区也面临着城乡二元结构突出,区域内要素流动阻滞等问题,制约着区域城乡高质量融合及一体化发展。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在中国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及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背景下,党中央多次以政策规划文件部署区域发展,以深化城乡改革为导向,破除二元体制机制障碍,不断推进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2008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以制度性的文件明确了要以推动“长三角一体化”破除区域城乡发展的阻碍,意味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入了新阶段。2018年中央发布

的《长三角一体化规划纲要》标志着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并紧扣高质量和一体化发展,推动实现区域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

根据《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发展规划纲要》,长三角地区主要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的多个城市,并以区域内27个城市为中心区,辐射带动整个区域高质量发展,城乡融合发展作为解决长三角地区城乡发展矛盾的重要手段,对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2 数据来源

在综合考虑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本文以2006—2017年长三角地区各中心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国土统计年鉴》、各城市政府网站、统计局数据及统计公告,各市农业农村局依法申请公开数据、农业局官方网站等;其中部分缺失数据采取线性插值法或均值插值法进行补充。

2023年11月

3.3 研究方法及变量选择

3.3.1 中介效应模型设定

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采用bootstrap中介效应方法,运用Stata16设定样本重复1000次,实证检验政府管控行为、土地市场化配置及城乡融合发展之间的内在作用关系。相较于常用的传统的逐步回归方法及Sobel检验方法,基于bootstrap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可以进行更准确的统计,并且可以克服逐步回归中自变量需要对因变量产生显著性影响的前提条件,从而可直接测出中介效应,避免产生“遮掩效应”^[32,33]。本文设定的基准模型如下:

$$Y=cX+\mu_1 \quad (4)$$

$$M=aX+\mu_2 \quad (5)$$

$$Y=c'X+bM+\mu_3 \quad (6)$$

$$c=c'+ab \quad (7)$$

式中: Y 表示因变量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X 表示自变量政府管控行为(税收和产业政策); M 表示中介变量土地市场化(土地一级市场化和农地市场化); a, b, c, c' 表示待估系数; μ_1, μ_2, μ_3 均表示随机误差项。式(4)表示政府管控行为对城乡融合

发展的直接影响;式(5)表示政府管控行为对土地市场化的中介效应;式(6)表示政府管控行为通过土地市场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间接影响。上述模型中,中介效应(间接效应)为系数 a 与 b 的乘积,式(7)反映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的关系。

3.3.2 变量选择

城乡融合发展是衡量城乡地域系统发展统一性与相对性的综合指标,其核心要义就是通过要素流动与资源配置实现城乡地域系统在经济、社会、生态、空间等方面的互动融合,最终实现城乡等值化发展^[23]。因此,本文在参考既有研究的基础上^[34-36],从经济、社会、生态、空间4个层面构建了城乡融合发展的指标体系(表1)。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变异系数法测度其权重,最终得到长三角地区各中心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核心解释变量包括农地市场化水平、城市土地一级市场化水平、政府管控行为等。其中,农地市场化水平包括农地流转市场化和农地非农化(土地征收市场),参考周佳宁等^[22]的做法,以土地流转面积表征农地流转;考虑到当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表1 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of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维度	指标	指标解释	属性
经济融合	非农产业与农业产业比值	二三产业GDP/第一产业GDP	正
	人均GDP/(元/人)	GDP总产值/总人口	正
	城乡恩格尔系数之比	城市恩格尔系数/乡村恩格尔系数	正
	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消费之比	城市人均消费/农村人均消费	负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之比	城市人均收入/农村人均收入	负
	城乡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万元/人)	城乡固定资产投资/总人口	正
社会融合	城乡文教娱乐支出之比	城市文教娱乐支出/农村文教娱乐支出	负
	城乡人均医疗支出之比	城市人均医疗支出/农村人均医疗支出	负
	城乡交通通讯支出之比	城市人均交通通讯支出/农村人均交通通讯支出	负
	城乡养老保险覆盖率/%	养老保险缴纳总人数/总人口	正
	城乡失业保险覆盖率/%	失业保险缴纳总人数/总人口	正
空间融合	城乡居民执业医师占比/%	城乡居民执业医师/总人口	正
	土地城镇化水平/%	建成区面积/土地总面积	正
	人口城镇化水平/%	城镇人口/总人口	正
	城乡流动网络/(km/km ²)	公路运营里程/土地总面积	正
	城市空间扩张系数	建成区面积/农作物种植面积	负
生态融合	城乡就业人数系数/%	城乡居民就业人数/总人数	正
	城乡生活垃圾处理/%	生活垃圾无害处理率	正
	污水治理系数/%	污水处理率	正
	工业固体废物处理/%	城乡固体废物处理率	正

入市还处于试点初期阶段^[27],当下法律及制度规定下的农地非农化的主要路径还是通过农地征收实现,而农地征收面积部分城市无法全部获取,因此选用各中心城市的建成区面积作为农地非农化水平的代理变量;参考相关研究^[37],采用加权平均方法综合测算得到最终的农地市场化水平。学界普遍认为城市土地二级市场比较完备,并且主要是发生在城市内部使用权转让或者转租的市场行为,故本文只考虑土地一级市场化的影响,参考钱忠好等^[37]的研究,采用招拍挂出让宗数的占比作为土地一级市场化水平的代理变量;政府管控行为主要包括税收政策和产业政策^[38],税收政策以地方税收占GDP比重表征,产业结构合理化作为产业政策的代理变量^[39],计算公式如下:

$$theil_{i,t} = \int_{m=1}^n y_{m,i,t} \times \ln\left(\frac{y_{m,i,t}}{l_{m,i,t}}\right) \quad (8)$$

式中: $theil_{i,t}$ 表示产业结构合理化; $y_{m,i,t}$ 代表城市 i 在 t 年份 m 产业产值在城市生产总值中的占比(%); $l_{m,i,t}$ 表示城市 i 在 t 年份 m 产业从业人员在总从业人员中的比值(%). 参考相关研究^[1,34],控制变量选取对外开放水平(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比重)及产业发展水平(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lnURI代表城乡融合发展水平;lnUM、lnRIM分别代表城市土地一级市场化和农地市场化水平;lnTA、lnIR分别表示政府管控行为中的税收政策、产业政策;lnJET、lnIDL为控制变量,分别代表对外开放水平和产业发展水平,各变量的描述统计见表2。

表2 变量描述统计分析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统计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lnURI	-2.700	-0.664	-1.426	0.444
lnUM	1.945	4.605	4.225	0.522
lnRIM	1.397	5.375	3.980	0.811
lnTA	-0.431	2.994	2.010	0.538
lnIR	-7.439	-0.580	-2.178	1.110
lnJET	1.054	6.705	3.530	0.987
lnIDL	1.379	6.591	4.440	0.464

4 结果与分析

4.1 政府管控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回归结果分析

表3模型(1)是政府管控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直接效应,结果显示税收政策在1%显著水平上促进长三角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提高。长三角地

表3 中介作用分析结果

Table 3 Mediation effect analysis results				
	模型(1) lnURI	模型(2) lnUM	模型(3) lnRIM	模型(4) lnURI
lnTA	0.138*** (4.142)	0.123** (2.229)	0.204** (2.391)	0.095** (3.104)
lnIR	-0.018 (-1.013)	0.080** (2.770)	0.011 (0.251)	-0.030* (-1.895)
lnUM				0.138*** (4.419)
lnRIM				0.130*** (6.485)
lnJET	0.268*** (13.791)	0.035 (1.104)	0.057 (1.148)	0.255*** (14.555)
lnIDL	0.322*** (8.360)	-0.044 (-0.691)	0.205** (2.075)	0.302*** (8.609)
常数	-4.119*** (-21.554)	4.223*** (13.381)	2.483*** (5.072)	-5.025*** (-23.202)
样本量	323	323	323	323
R ²	0.513	0.036	0.040	0.607

注:***、**、*分别表示1%、5%、10%水平的显著性,括号内为 t 值。下同。

区作为引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及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功能及示范区,开始通过构建规范的政府财税和用地政策,逐步转变地方政府“以地谋发展”模式的发展路径,通过优化供地结构、方式,依据城乡居民的偏好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激发一级市场结构改革制度红利,助推城乡融合发展;此外,以普惠金融为代表的包容性金融能够拓宽农村金融信贷渠道从而盘活城乡经济发展,激活乡村发展潜力,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产业政策负向影响城乡融合发展,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尽管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快,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及优化升级可以促进城乡生产要素高效配置,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但由于农村地区三产融合及结构优化仍处于发展初期,尚未释放改革及结构发展的红利,不能有效激发乡村内生发展潜力,最终致使产业结构调整效应表现为不显著。

4.2 政府管控对土地市场化的回归结果分析

表3模型(2)是政府管控对中介变量土地一级市场化的回归结果,以税收和产业政策表征的政府管控行为对城市土地一级市场、农地市场化产生正向作用,并通过5%显著水平的检验,这也与郭海红等^[35]的研究结论保持一致,作为东部沿海较为发达的区域,长三角地区地方政府充分利用财政收入自

2023年11月

主权,开始逐步调整差异性、干预性及非效率化供地策略,从而实现城乡之间要素的优化配置,突破区域土地利用效率的“洼地”,此外户籍制度改革及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的实施,能够有效缓解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调,畅通城乡之间人口等要素的流通。由模型(3)可知,以产业政策表征的政府管控行为推动农地市场化的发展,并通过5%显著水平的检验,这与苏春红等^[40]的研究结论保持一致。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区域内强大的经济发展水平、创新能力加快产业结构合理化及高级化发展,不断驱动经济发展从要素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发展的优化转型,从而倒逼区域土地供给回归到正常状态的要素功能及资本水平,有利于土地要素市场化的发展^[41],实现区域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和产出效率的双提升。同时,政府产业结构政策的调整能够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及发展,实现农村存量用地及闲散用地的高效利用,并通过市场机制和价格约束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推动长三角地区城乡融合发展。

4.3 土地市场化的中介作用结果分析

表3模型(4)结果显示城市土地一级市场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城市土地一级市场化每提高1个单位,会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提高13.8%。这充分表明不断推动城市土地一级市场化发展是优化区域城乡融合发展的有效路径,这是因为市场机制的嵌入发挥土地增值收益的资源配置效应、融资效应等,提升土地的经济、社会及空间价值,从而加快推动城镇化进程,有利于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此外,模型(4)结果说明农地市场化可以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提高,这是因为农地市场化的不断发展推动土地市场供应主体的多元化,有利于打破政府土地一级市场垄断局面,并通过市场机制和价格约束实现农地资产的增值,从而激发乡村产业的发展及实现乡村人口的非农化转移,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表4展示了政府管控行为(税收政策和产业政策)、土地市场化(城市土地一级市场化、农地市场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结果。其中,土地市场化在税收政策与城乡融合之间发挥正向中介作用,并且农地市场化和城市土地一级市场化都为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19.29%、12.26%,说

表4 土地市场化的中介效应量结果及中介类型

Table 4 Quantitative results and types of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land marketization

	检验结论	c 总效应	a×b 中介效应	c' 直接效应	效应占比/%
$\ln TA \Rightarrow \ln UM \Rightarrow \ln URI$	部分中介	0.138	0.017	0.095	12.26
$\ln TA \Rightarrow \ln RIM \Rightarrow \ln URI$	部分中介	0.138	0.027	0.095	19.29
$\ln IR \Rightarrow \ln UM \Rightarrow \ln URI$	中介效应不显著	-0.018	0.011	-0.030	0.00
$\ln IR \Rightarrow \ln RIM \Rightarrow \ln URI$	中介效应不显著	-0.018	0.001	-0.030	0.00

明以税收政策表征的政府管控行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促进土地市场化发展间接提升区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并且相比于城市一级市场化,税收政策更多通过农地市场化来发挥影响作用。

由表4可知,产业政策未能通过促进土地市场化发展提高区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对此,合理的解释为:尽管长三角地区逐步从资源要素投入转向以知识技术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并以此倒逼区域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和产出效率的双提升,但“以地谋发展”制度惯性的存在导致产业转型需要阶段性的转变,这种结果属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过程产生的摩擦性阵痛。此外,由于制度性及物理性障碍的存在,导致乡村产业发展与农村土地要素之间的互动作用未能充分发挥,进而导致实际的产业政策调整与目标之间存在现实偏差^[42]。

4.4 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上述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参考相关研究^[43,44],采用常用的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采用熵值法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重新测度,并再次带入到回归模型中。由表5可知,在替换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le 5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ln URI$	$\ln UM$	$\ln RIM$	$\ln URI$
$\ln TA$	0.115** (4.157)	0.123* (2.229)	0.204* (2.391)	0.078** (3.117)
$\ln IR$	-0.021 (-1.485)	0.080** (2.770)	0.011 (0.251)	-0.031* (-2.350)
$\ln UM$				0.098** (3.836)
$\ln RIM$				0.122** (7.384)
样本量	323	323	323	323
R^2	0.520	0.036	0.040	0.621

掉被解释变量后,各变量的影响结果未发生较大的变化,这也在较大程度上证明本文模型的稳健性。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5.1 结论

本文运用2006—2017年长三角地区中心城市面板数据,首先从理论层面剖析政府管控、土地市场化及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然后采用bootstrap中介效应模型对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主要结论如下:

(1)理论分析表明土地市场化配置能够带来社会经济发展效益的增加,而政府管控下的土地市场化配置存在不确定性,由于土地准公共物品的属性及政府有限理性,决定城乡融合驱动下的土地资源取向需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协同作用。

(2)政府管控行为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呈现差别化,其中税收政策可以有效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产业政策未能发挥显著影响作用。此外,农地市场化、城市土地一级市场化都能够在1%显著水平上推动区域城乡融合发展。

(3)从中介效应结果来看,研究时段内以税收政策表征的政府管控行为通过促进农地市场化、城市一级市场化发展两条路径推动区域城乡融合发展,并且中介效应路径占比分别为19.29%、12.26%,而以产业政策表征的政府管控行为则未能发挥显著效应。

5.2 政策启示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1)清晰界定政府和市场职能边界,探索推进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有效路径。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探索完善多种路径土地发展权市场交易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土地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来看,经济发展转型过程中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缺一不可,强调市场在土地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要否定政府的作用,而应逐步调整政府在土地市场化交易中的地位和职能作用,通过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优化政府市场监管和行政审批管理机制、土地收益分配机制以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高效联合,促进土地资源在城乡之间的优化分配,助力区域城乡融合发展。

(2)深化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促进城乡资源要

素的优化配置。城乡二元制度是制约土地要素在城乡之间高效流转配置的重要原因,并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障碍。因此,新时期应着力构建“同地、同权、同价”的城乡建设用地体系,为城乡之间要素流动提供空间和制度保障。稳步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逐步打破政府对国有土地一级供地市场的垄断,优化土地供给结构,在“同地同权同价”原则基础上提高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效率,使集体建设用地价值得到更高层次的释放,助力形成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动力。

(3)统筹城乡制度体系联动改革,促进城乡市场联袂发展。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以土地推动发展的动力逐渐减弱,不可持续性凸显。加快财政体制改革,优化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纠正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及资源配置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加大财政支农及出让收益分配农村的比例,促进城乡之间实现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及空间价值的协调共享及利益均衡。同时,开展土地制度改革与区域产业政策和税收政策的联动改革,使城乡地域最大程度上平等共享综合改革的制度红利,提高政府综合利用税收、产业政策调整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着力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城乡居民平等共享经济发展红利,助推城乡融合发展。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陈坤秋, 龙花楼. 中国土地市场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J]. 自然资源学报, 2019, 34(2): 221-235. [Chen K Q, Long H L. Impacts of land market on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 China[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9, 34(2): 221-235.]
- [2] 姜海, 田双清, 陈乐宾. 基于共识视角的新时代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 2022, (2): 70-84. [Jiang H, Tian S Q, Chen L B. Research on the reform of market-oriented allocation of land factors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consensus perspective[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22, (2): 70-84.]
- [3] 钱忠好, 牟燕. 中国土地市场化改革: 制度变迁及其特征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 2013, 34(5): 20-26. [Qian Z H, Mu Y. Land market reform in China: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character analysis[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3, 34(5): 20-26.]
- [4] 曾龙, 陈淑云, 付振奇. 土地规模化经营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J]. 资源科学, 2022, 44(8): 1560-1576. [Zeng L, Chen S Y, Fu Z Q. Impact of large-scale land management on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nd mechanism[J]. Re-

2023年11月

- sources Science, 2022, 44(8): 1560-1576.]
- [5] 陈坤秋, 王良健, 屠爽爽, 等. 效率与协调: 土地市场助推城镇化发展的证据[J]. 经济地理, 2019, 39(3): 37-47. [Chen K Q, Wang L J, Tu S S, et al. Efficiency and coordination: How does land market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J]. Economic Geography, 2019, 39(3): 37-47.]
- [6] 曲福田, 田光明. 城乡统筹与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J]. 管理世界, 2011, (6): 34-46. [Qu F T, Tian G M. The coordination urban growth between r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reform of the system of the property right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land[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11, (6): 34-46.]
- [7] 张合林. 以土地市场制度创新推动城乡融合发展[J]. 中州学刊, 2019, (3): 38-44. [Zhang H L. Research 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through the innovation of land market system[J]. 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2019, (3): 38-44.]
- [8] 林津, 吴群, 刘向南. 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的潜在风险及其管控[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1): 183-192. [Lin J, Wu Q, Liu X N. The potential risks of “Three Rights Separation” system reform of homestead land and its control[J]. Journal of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2, (1): 183-192.]
- [9] 马翠萍.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制度探索与效果评价: 以全国首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为例[J]. 中国农村经济, 2021, (11): 35-54. [Ma C P. Exploration and evaluation of collective operating construction land system: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first batch of pilot projects[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21, (11): 35-54.]
- [10] 张博胜, 杨子生. 中国城乡协调发展与农村贫困治理的耦合关系[J]. 资源科学, 2020, 42(7): 1384-1394. [Zhang B S, Yang Z S.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rur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rural poverty governance[J]. Resources Science, 2020, 42(7): 1384-1394.]
- [11] 钱文荣, 朱嘉晔, 钱龙, 等. 中国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探源[J]. 农业经济问题, 2021, (2): 4-14. [Qian W R, Zhu J Y, Qian L, et al. Study on the rural land factor marketization reform in China [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21, (2): 4-14.]
- [12] 宋洋, 朱道林, 张立新, 等. 2000年以来黄河流域土地市场化时空格局演变及驱动因素[J]. 自然资源学报, 2020, 35(4): 799-813. [Song Y, Zhu D L, Zhang L X, et al.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driving factors of land marketiza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since 2000[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0, 35(4): 799-813.]
- [13] 徐升艳, 陈杰, 赵刚. 土地出让市场化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 中国工业经济, 2018, (3): 44-61. [Xu S Y, Chen J, Zhao G. How does the land leasing marketization affect the economic growth? [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8, (3): 44-61.]
- [14] 何明俊. 作为公共政策的土地发展权: 关于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思考[J]. 城市规划, 2022, 46(11): 14-20. [He M J. Land development rights as a public policy: Thoughts on establishing a unified construction land market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J]. Urban Planning, 2022, 46(11): 14-20.]
- [15] 张占录, 卫思夷. 引入土地发展权构建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框架: 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22, 36(6): 147-161. [Zhang Z L, Wei S Y. On the framework for introducing land development rights to build a unified market for urban-rural land of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J]. Journa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2022, 36(6): 147-161.]
- [16] 刘奎, 王健. 土地经营对中国城市空间扩张的驱动机制: 基于273个地级市的实证分析[J]. 资源科学, 2021, 43(4): 764-775. [Liu K, Wang J. Driving mechanism of land management on urban spatial expansion in China: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273 prefecture-level cities[J]. Resources Science, 2021, 43(4): 764-775.]
- [17] 谢鹏. “以地生财”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来自中国地级市的经验证据[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9, (3): 76-84. [Xie P. On land finance and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J]. Journal of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2019, (3): 76-84.]
- [18] 姚树荣, 陈镭民, 崔耀文. 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2, 13(6): 35-53. [Yao S R, Chen K M, Cui Y W. Market-oriented allocation of land factors and smoothing the National Economic Circulation[J].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2022, 13(6): 35-53.]
- [19] 龙登高, 黄一彪. 平均地权与要素市场化: 历史比较与理论启示[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40(1): 85-92. [Long D G, Huang Y B. Equalization of land property rights and marketization of the production factors: Historical comparison and theoretical enlightenment[J]. Journal of Yunn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3, 40(1): 85-92.]
- [20] 钱忠好, 牟燕. 土地市场化是否必然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基于中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的检验[J]. 管理世界, 2013, (2): 78-89. [Qian Z H, Mu Y. Does the land mercerization expand necessarily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 study based on the test of a provincial-level panel data in China between 2003 and 2008[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13, (2): 78-89.]
- [21] 方达, 郭研. 农村土地流转、资本有机构成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验与实证证据[J]. 经济学家, 2020, (11): 107-115. [Fang D, Guo Y. Rural land circulation, capital organic composition and urban-rural income gap: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and empirical evidenc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J]. Economist, 2020, (11): 107-115.]
- [22] 周佳宁, 段锴丰, 杜焱强, 等. 土地要素配置如何促城乡多维融合?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J]. 中国土地科学, 2022, 36(3): 32-40. [Zhou J N, Duan K F, Du Y Q, et al. How does land allocation promote urban-rural multi-dimensional integration? An efficient market and effective government[J]. China Land Science, 2022, 36(3): 32-40.]
- [23] 何仁伟. 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 理论探讨、机理阐释与实现路径

- [J]. 地理研究, 2018, 37(11): 2127-2140. [He R W.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ory, mechanism and implementation[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37(11): 2127-2140.]
- [24] 钱忠好, 马凯. 我国城乡非农建设用地市场: 垄断、分割与整合[J]. 管理世界, 2007, (6): 38-44. [Qian Z H, Ma K. China's urban and rural non-agricultural construction land market: Monopoly, division and integration[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07, (6): 38-44.]
- [25] 胡乐明, 王杰. 非自愿性、非中立性与公共选择: 兼论西方公共选择理论的逻辑缺陷[J]. 经济研究, 2020, 55(12): 182-199. [Hu L M, Wang J. Non-voluntariness, non-neutrality and public choice: The logical defects of western public choice theory[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20, 55(12): 182-199.]
- [26] 谭荣, 曲福田. 中国农地非农化与农地资源保护: 从两难到双赢[J]. 管理世界, 2006, (12): 50-59. [Tan R, Qu F T. Farmland conversion and farmland resources protection in China: From dilemma to win win[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06, (12): 50-59.]
- [27] 翁贞林, 唐文苏, 湛洁. 乡村振兴视野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 演进逻辑、现实挑战与未来展望[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3): 188-196. [Weng Z L, Tang W S, Chen J. Direct market entry of rural collective commercial construction land in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volutionary logic, realistic challenges and future prospects[J]. Journal of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2, (3): 188-196.]
- [28] 严金明, 蔡大伟, 夏方舟.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进展、成效与展望[J]. 改革, 2022, (8): 1-15. [Yan J M, Cai D W, Xia F G. The reform of rural land system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Progress, achievements and prospect[J]. Reform, 2022, (8): 1-15.]
- [29] 苏红键. 人口城镇化趋势预测与高质量城镇化之路[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22, (2): 48-56. [Su H J. Forecast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trend and the road of high-quality urbanization[J]. Studies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2022, (2): 48-56.]
- [30] 董丽娟. 财政政策助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着力点[J]. 财政科学, 2021, (4): 93-98. [Dong L J. The focus of public finance policy facilitating the new pattern of dual-circulation development[J]. Fiscal Science, 2021, (4): 93-98.]
- [31] 任迎伟, 胡国平. 城乡统筹中产业互动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08, (8): 65-75. [Ren Y W, Hu G P. Industries' interaction in comprehensive coordin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08, (8): 65-75.]
- [32] 邢中先. 乡村产业振兴应对多重阻隔现象的核心思路[J]. 北京社会科学, 2022, (6): 91-100. [Xing Z X. The core idea of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to deal with the phenomenon of multiple falling distances[J]. Social Sciences of Beijing, 2022, (6): 91-100.]
- [33] 杨慧琳, 袁凯华, 陈银蓉, 等. 农户分化、代际差异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 基于宅基地价值认知的中介效应分析[J]. 资源科学, 2020, 42(9): 1680-1691. [Yang H L, Yuan K H, Chen Y R, et al. Effect of farmer differentiation and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on their willingness to exit rural residential land: Analysis of intermediary effect based on the cognition of the homestead value[J]. Resources Science, 2020, 42(9): 1680-1691.]
- [34] 周佳宁, 邹伟, 秦富仓. 等值化理念下中国城乡融合多维审视及影响因素[J]. 地理研究, 2020, 39(8): 1836-1851. [Zhou J N, Zou W, Qin F C. Review of urban-rural multi-dimensional integr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China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equivalence[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0, 39(8): 1836-1851.]
- [35] 郭海红, 刘新民, 刘录敬.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区域差距及动态演化[J]. 经济问题探索, 2020, (10): 1-14. [Guo H H, Liu X M, Liu L J. Regional disparity and dynamic evolution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J]. Inquiry into Economic Issues, 2020, (10): 1-14.]
- [36] 叶超, 庄良, 吴佩瑾. 长三角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的时空格局[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2(4): 43-51. [Ye C, Zhuang L, Wu P J.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and patterns of rural-urban integr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J]. Journ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1, 42(4): 43-51.]
- [37] 钱忠好, 牟燕. 中国土地市场化水平: 测度及分析[J]. 管理世界, 2012, (7): 67-75. [Qian Z H, Mu Y. China's land marketization level: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12, (7): 67-75.]
- [38] 李瑶, 李磊, 刘俊霞. 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与高质量发展: 基于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的经验研究[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2, 44(2): 16-30. [Li Y, Li L, Liu J X. Active government, efficient market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moderating effect and threshold effect[J]. Journal of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22, 44(2): 16-30.]
- [39] 郭沛, 梁栋. 低碳试点政策是否提高了城市碳排放效率? 基于低碳试点城市的准自然实验研究[J]. 自然资源学报, 2022, 37(7): 1876-1892. [Guo P, Liang D. Does the low-carbon pilot polic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urban carbon emissions? Quasi-natural experimental research based on low-carbon pilot cities[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2, 37(7): 1876-1892.]
- [40] 苏春红, 李真. 财政分权、支出偏向与城乡融合发展[J]. 经济问题探索, 2022, (6): 107-123. [Su C H, Li Z.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expenditure bias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J]. Inquiry into Economic Issues, 2022, (6): 107-123.]
- [41] 张琳, 黎小明, 刘冰洁, 等. 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能否促进工业结构优化? 基于微观土地交易数据的分析[J]. 中国土地科学, 2018, 32(6): 23-31. [Zhang L, Li X M, Liu B J, et al. Can land marketization promot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micro land transfer data[J]. China Land Science, 2018, 32(6): 23-31.]
- [42] 李鑫, 马晓冬, 胡嫚莉. 乡村地域系统人-地-业要素互馈机制研究[J]. 地理研究, 2022, 41(7): 1981-1994. [Li X, Ma X D, Hu

- M L. The mutual feedback mechanism of human-land-industry factors of the rural regional system[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2, 41(7): 1981-1994.]
- [43] 杨冕, 徐江川, 杨福霞. 空间溢出视角下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共同前沿稳健生产率的实证检验[J]. *统计研究*, 2022, 39(9): 29-45. [Yang M, Xu J C, Yang F X.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urban green produc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An empirical test based on the meta-frontier robust estimation[J]. *Statistical Research*, 2022, 39(9): 29-45.]
- [44] 唐勇, 吕太升. 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城市就业的影响[J]. *城市问题*, 2022, (3): 66-75. [Tang Y, Lv T H.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urban employment in China[J]. *Urban Problems*, 2022, (3): 66-75.]

Impact mechanism of land resource allocation on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ZHAO Wei¹, ZHU Peixin²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2. China Institute of 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Market-based allocation of land factors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improving China'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and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building a dual-cycle development pattern.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land resource allocation o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t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levels. [Methods]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from 2006-2017 in the central cities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and using the bootstrap mediation effect model, an empirical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the intrinsic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control, land marketization, and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Results] (1) Theoretically, a unified market-based urban-rural land allocation system can bring about an increase in social welfare compared with a divided state, while the quasi-public goods attribute of land and the limited rationality of the government dictate that the allocation of land resources under the orientation of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should be between a "responsive government" and an "effective market". (2) The government's control behavior, characterized by tax polic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level of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but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policy is not significant, and both the marketization of urban land and the marketiza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d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evel of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3) The mediation effects of marketiza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and urban land were 19.29% and 12.26% respectively in the path of tax policy affecting the level of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land marketization between industrial policy and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was not significant. [Conclusion] Clearly defining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land property rights system, and improving the linkag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institutional systems are the directions of future reform.

Key words: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land resource allocation; government's management and control behavior; mediation effect model;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